

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思索

THOUGHTS ON CHINA'S MODERNIZATION MOVEMENT

唐翼明

一、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图景

“现代化”一词流行的历史大约还不过几十年，但现代化运动的事实却存在好几个世纪了。诚然，关于“现代化”和“现代”，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者，往往有不同的定义，学术界几十年来为此问题一直缠讼不休。我自己倾向于把“现代化”看成是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而至今尚未完成的一个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人类文明史上发生了两次巨变。第一次巨变是从“文明前期社会”（或称“原始社会”）变为“文明社会”，第二次巨变是从“文明社会”变为“文明后期社会”（或称“现代社会”）。每一次巨变都发生在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引起第一次巨变的思想解放运动发生在公元前一千年内。当时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这四大古老文明都先后独立地、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飞跃，西方学者称之为“哲学的突破”或“超越的突破”。引起第二次巨变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了。从那以后，世界上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着一连串空前伟大的事变，这一连串空前伟大的事变都朝向着一个目标，即将整个人类社会由“文明社会”推向“文明后期社会”即“现代社会”。因此，我们不妨给文艺复兴以来的这一连串空前伟大的事变一个总的名称，即“世界现代化运动”。这一连串空前伟大的事变包括以牛顿为代表的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英国的产业革命和宪章运动、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工业化、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两次世界大战、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等等。这个世界范

围内的现代化运动现在还方兴未艾，正在一波接一波地向前发展着，还远未达到其成熟与收获的季节。

第二次巨变有着与第一次巨变很不相同的特征。第一次巨变是四大文明各自独立地、方式各异地先后完成的。第二次巨变却是在世界范围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象一串连锁反应，方式也大同小异。这当然是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达，尤其是交通工具的发达有以致之。虽然第二次巨变的整个图景现在尚不完全明晰，但就已经走过的部分来看，则显然呈现出一幅参差不齐的面貌，即小部分国家为先锋先行，而大部分国家以它们为目标努力追赶。具体地说，就是少数经过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国家，在短短的二三百年内迅速地跃进到世界的先进地位，而把没有蒙受产业革命之福的其他国家远远地甩到了自己的后面。这少数先进的西方国家在国力强盛之后便开始侵略、掠夺以至征服别的国家，终于迫使被侵略、被掠夺、被征服的国家一一觉醒过来。所谓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无非就是描述这种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参差不齐的状况。这种参差不齐是一种变动的参差不齐，发达、发展中、不发达的区别并非一成不变，暂时领先的不一定永远领先，暂时落后的不一定永远落后。几十年前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东方还是界线分明，现在这个界线就开始模糊了，而且还将进一步模糊下去。所以，几十年前，人们还普遍把“现代化”同“西化”等同起来，而现在“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已经成为学者公认的常识了。

但是，这场现代化的赛跑基本上是沿着同一个

轨道，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沿着少数接受过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先进国家所开辟的道路前进，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少到目前来说还大体上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则“现代化”同“西化”又有相当本质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个后起国家的现代化运动，都要经历相当程度的“西化”。理由很简单，盖所谓“现代”者，迄今主要是由西方先进国家所代表着。“现代”是什么样子？就现今所能看到的而言，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目前的样子：“现代化”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完全）化为目前西方先进国家的样子。

也正基于这种事实，西方现代某些学者倾向于把现代化分为两型。一型是所谓“本土型”或“内发型”，另外一型则是所谓“后来者”或“外激型”。前者指在现代化运动中少数先行的西方国家，后者指绝大多数起而追赶的国家。前者的动力在“创新”，后者的动力在“借取”。但这个两分法显然是很粗略的，实际情况远较此为复杂。特别是“后来者”中，情形至为纷繁。我们虽然不必也不能将这种复杂纷繁的情况一一理清，但我觉得有两大类“后来者”型是非常明显而又值得特别加以区分的。一类是基本上模仿“本土型”的样子搞现代化的，如德国、日本；另一类基本上是以“本土型”为对立面来搞现代化的，如苏联。如果借用熟悉的名词，前者可称为“资本主义型”，后者可称为“社会主义型”。这两型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区分它们对于研究世界及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较资本主义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但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或展望不久的将来，这个理论都还有待历史进一步发展的确证。不过，不少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其中极少数国家，例如苏联，已成为较为现代化的国家，这也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所以我宁可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看成先后出现而同时并存的两种现代化社会的模式。前者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后者以苏联为典型代表。可以预见，世界将通过这两种模式一步一步地走向现代化。换句话说，后起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将根据自己的国情，不是以美为师，就是以苏为师。同时可以预见的是，这两种模式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相互对立、相互竞争，相互借鉴而又相互吸收。事实上，现在世界上已经找不出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找不出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以最为典型的美、苏为例，美国自从实行罗斯福的新政以后（亦即采用凯恩斯的经济理

论学说，实行政府有效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以后），不是已经采取了部分可称为社会主义的政策吗？而苏联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现在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一直在汲取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吗？至于英、法、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有着相当浓厚的社会主义气息，而南斯拉夫、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着相当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则更是人所共见的事实。当年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某些严重弊病，就断定它必然一步步病入膏肓，不可救药，非灭亡不可，而没有看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一套调节、修复的机制，而最令人惊讶，也绝对是马克思始料所不及的是，其中最重要的调节修复机制之一竟是主动地采取某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同样地，后来不少西方学者们看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严重弊病，也曾断定它必短命而亡，而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也具有一套调节、修复的机制，而其中最重要的调节修复机制之一竟是主动地采取某些资本主义的原则。这在意识形态专家们看来，当然是不可饶恕的谬误。但历史常常是要闹点小脾气的，他并不想老是迁就意识形态的逻辑。

以上便是我所见到的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图景。

二、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回顾

如果说，世界的现代化运动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则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应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虽然在此之前，从明末徐光启译《几何原本》，李之藻译《谈天》起，西方学术已开始零星传入中国，但正如轻风拂海，未曾微波。直至被英国军舰上的巨炮轰开大门之后，这老大的中央帝国才从恶梦中惊醒，慢慢意识到自己的贫弱朽败而逐渐兴起变辙图强的要求。一个半世纪以来，无数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各式各样的主义、党派风起云涌，虽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然究其大归，莫不是痛感于祖国的衰败和愚昧落伍，思欲一扫积困，重振雄风，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当世先进国家并驾齐驱。

由于这种背景，中国现代化运动一开始就具有非常复杂矛盾的性格。第一，它是发生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并且曾经创造辉煌显赫的文明，而又一直封闭，自成体系，只有融化别种文化，而从未被别种文化所融化的记录的国度里。它有昔日的荣光不可忘怀，又有沉重的包袱难以遽弃。第二，它是受到一个新兴的前所不知的文明的挑战而不得不起而应战的，它有强烈的不甘认输和

雪耻图强的意念，而缺乏自下而上，由于经济发展而逐步引发的自发性动力。第三，他又不得不向这个挑战的新文明学习，因为事实证明这个新文明是有优势的。第四，这个优势的证明是一步步来到的，是伴着侵略和压迫来到的；中国也是一步步认识到并加以承认的，伴着痛苦和屈辱承认的。开始是军事的优势，后来是经济的优势，政治的优势，最后连中国人向来引为骄傲的文化似将也证明是比不上西方的了。第五、还有最后一点，也是最不幸的一点，是中国在试图现代化、世界化的过程中，西方列强几乎一致采取了敌视、阻挠而不是扶持、乐观其成的态度，它们一直想把中国这个东方巨狮继续锁在一个传统的铁笼里。这同他们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的事实连在一起，使中国现代化运动经常伴有不信任西方的情绪。中国现代化运动这种复杂矛盾的性格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历程。沮丧与挫败、排外与崇洋主义之蜂起、党派之林立，乃至后来孙中山以俄为师，毛泽东师心自用，邓小平实行有限度的开放，无不可从中国现代化运动一开始就具备的复杂矛盾性格中找到依据。

学者们在研究中国现代化运动时习惯按时间顺序和历史事件分为若干阶段，例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这自然不错。但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拟对中国现代化运动提出一个新的分段方法如下：

第一阶段：学习西方（1840～1949年）；

第二阶段：学习苏联（1949～1959年）；

第三阶段：闭关自闯（1959～1978年）；

第四阶段：在苏式体制基础上有限度地学习西方（1978～现在）。

这当然是就大陆情形而言，至于台湾1949年以后走的是与大陆完全不同的路子，此处暂不备论。

第一阶段最长，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觉醒阶段。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对于整个世界的形势茫昧无知，盘旋在他们脑海中的只是“雪耻”一念，对于中国的落后他们顶多只意识到技术的层面，因而所谓“学习西方”也就仅止于此。详务诸人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冯桂芬、孙家鼐、张之洞）的主张就是这种观念的反应。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无足深责。至甲午海战，经日本一击，洋务运动遂告破产，中国先进分子才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单在技术层面，而且在制度层面，于是有康梁的变法，直至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但民国的建立并未能阻止袁世凯与日本谋签二十一条，也未能阻止巴黎和会上德国从日

本手里接收山东权益。总之，中国之贫弱如故，中国之被欺侮如故。于是有“五四”运动，有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此时已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根子乃在思想和行为的层面，学习西方应从根本上做起，偏激一点的便提倡所谓“全盘西化”论。

按理说，中国经过这一段痛苦曲折的摸索，而逐渐有了较深认识，现代化运动应该可以走上正轨了。但这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苏联的建立为世界现代化运动提供了另一个模式。对西方一直怀有不信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容易就对于这个以西方列强为对立面的模式发生强烈的兴趣。而且，学习西方一直不成功的屈辱经验也使中国人很容易接受这个新的榜样。于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流行并且成立了共产党。第二件是不久之后日本侵入东三省并进一步进攻全中国，迫使全中国人民为国家民族的存亡而奋斗，现代化的事当然无从谈起了。以后是八年抗战结束，国共内战重起，直至1949年国民党迁至台湾，新政权在大陆确立。从此以后，国共分途，中国现代化运动也就分两支发展。台湾大体上还是沿着“学习西方”的路子走，但颇汲取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作法，形成一条新路，到今天正初见成效。大陆则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40年中又兜了不少圈子，至今尚在探索中。

1949年以后的头十年，大陆是全面“学习苏联”的十年。高层领导当初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能使中国迅速现代化的新路。关于这一点，详读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就清楚了。此文真实地反应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高层领导当时对苏联的看法，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总结了中国在现代化运动中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苏联”的客观背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方针即所谓“一边倒”，倒向苏联，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国际关系上无条件地倒向苏联，而且在一切国内制度上都全无例外地模仿苏联。党、政、军的建设不必说了，就连经济文化也都亦步亦趋。工业上，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消费工业；农业上，搞合作社、集体农场等等，无一不是学苏联。甚至小到大学院系的调整，工厂内党、政、工、团的关系，也都是依样画葫芦。

前面说过，中国现代化第一阶段中，对于“学习西方”的认识，经过百年的痛苦曲折，才逐渐由技术层面进到思想行为层面。但第二阶段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却是全面而彻底的，遍及所有上述的三个层面，因而成效也自然较

前一百年为显著。这成效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工业方面的生产力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有了明显的提高；第二，社会组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控制彻底的中央集权国家；第三，社会在思想观念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旧的观念被清除，许多新的观念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推行而为社会所接受或被迫接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二点。传统的中国社会大家公认是一盘散沙，1927年北伐胜利后有了一些进步，但整个社会的组织仍然是极为散漫的，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相当薄弱。1949年以后，中共在大陆建立一个中国有史以来最严密的社会，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政治、文化，甚至经济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统”局面。有趣的是，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也在台湾建立了一个组织几乎同样严密的社会，也达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完成了他们在大陆想做而没有做成功的事。现在不少西方学者指出，在“后来者”型的现代化运动中，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段国家集权的过程，政治因素和国家参与在这类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中表现特别强烈，而且是作为一个积极因素出现的。所以中央集权的形式和社会组织的严密只要不推向极端，应该看作是现代化运动初期获致的成就之一。

然而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所提出的好大喜功、急躁冒进的“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其原来的意图也在快速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但由于完全脱离中国国力的实际，结果遭到了惨败，引起了众所周知的大饥荒（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恰在这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向中国逼债，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毛泽东再次发现“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老大哥”只能容许“小弟弟”永远跟在后面，唯命是从，不容许“小弟弟”变得跟自己一样，平起平坐，后来甚至还发现这位老大哥简直要吃掉小弟弟（毛泽东说过：“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毛泽东当初以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到这时才明白这是一个天真的“迷梦”。

怎么办？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回到第一阶段所走的路上去，即再次向西方学习，先决条件是同美国和解；第二条是谁也不学，谁也不靠，自辟一条非西非苏“史无前例”的路。当时中美对抗的严峻形势使中国不得不选择第二条路。于是我们看到，甫从“三年自然灾害”中喘过气来，就开始了作为“文革”前奏的“四清运动”，接着又在1966年正式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事

件，至今还没有、恐怕在不久的将来也不可能有人对它作出全面的科学的评估，但从现代化运动这个特定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在“学习西方”和“学习苏联”两条路都没有走通的情况下，想突破困局，力图自辟一条“史无前例”的道路。所以“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口号是“横扫封、资、修，同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是现代化同历史上任何造成社会进化的改革一样，都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是对传统的扬弃，而非抛弃。这些浅显的道理是不难明白的。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以后已开始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他在次年接见基辛格，试图同美国和解就是一个证明。

所以在1978年邓小平执政，揭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旗帜以前，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已经进行了百年有余，并且可能的几条道路差不多都已走过了，但没有一条是成功的。看来只有回到起点，还是得向西方学习，主要是向美国学习。于是邓小平及其伙伴们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改革，当然是改革旧有的苏式体制；开放，则主要是向西方开放。但无论改革和开放都是有限度的。改革并不是把一切都改掉，只改掉必须改掉的部分；开放并不是无条件的开放，只引进必须引进的东西。至少邓小平的最初意图是如此。但是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国内体制基本上是苏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更一直是立党立国的根本。如何能使这些同学习西方协调起来呢？这是当前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真正两难之局。其实这这也是一个老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在第一阶段就遇到的问题，也就是前人所谓的“体、用”问题。换一个较为科学的方式来提问题，即：学习西方究竟应止于科技层面，还是应达到制度层面，甚至应到思想行为层面？大陆关于改革的争论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来的。于是我们立即可以发现，这些问题事实上在第一阶段就早已提出来，并且以痛苦曲折的代价，费了长达百年的时间才获致了某些一致的结论。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差不多同样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严重挫败。但历史毕竟是前进的，今天的世界形势和中国的情况却大大不同于一个世纪以前了。我们有理由期望这些问题能较快地获得解决，并且不要付出太重的代价。

三、历史和现实的启示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艰难曲折的道路，试验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和可能性，也

饱尝了徬徨探索及挫败停滞的痛苦，因而难免使人产生沮丧失望的情绪。但是我以为唯其如此，我们才可以对中国现代化的未来抱有审慎乐观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的话。所以下面我试图结合前面的分析，提出几个我们今后在现代化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第一、中国的现代化主要应该向西方学习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论。但仍然有两个问题要提出来约略说一说。首先，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一开始本来是以西方为师的，但是结果没有走通，只好转换方向。现在的情形同过去有什么不同吗？答曰：当然不同。当初没有走通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清朝顽固守旧的封建势力和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大大阻碍和延缓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一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断侵略促使中国人产生仇视西方的心理，并从而转向以俄为师。现在这两点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结果也就一定会跟从前不同。谓予不信，可看台湾。第二，向西方学习，怎样学、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曾经有两个著名的主张，一曰“中体西用”，一曰“全盘西化”。但这两者都已被历史证明为行不通。我认为当前实际可行的作法是，保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固有体系中真正合理有用的东西，其中既包括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明也包括1949年以来建立的革命体制中有用的东西。大胆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体制中的民主法制、高效率机制等能为我所用的部分。几千年的传统文明，不管曾经多么辉煌灿烂，但其中许多东西现在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继续前进的沉重负担，我们一定要彻底改造它。1949年以后建立的革命体制相对于封建制度进步之处是应当坚持的，但这个体制仍带有从我们固有文明中继承下来的强烈封建色彩，另一方面又带有从苏联学来的集权专政体制的色彩，这两方面应当抛弃，而代之以西方先进国家的民主意识及体制。

最后需要再说一句的是，既然是“主要应该向西方学习”，就并不排斥转益多师，同时汲取其他先进的经验，包括苏联的有益经验在内，这是没有疑义的。

第二、现代化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充满战乱的历史。每次稍稍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刚刚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立即被战乱耗掉了，再加上成倍增长的人口，哪里还有余力来投入大规模的再生产？所以无论如何要力争获致一段长期的和平安定的局面。

第三、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现阶段应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

虽然“现代化”包括许多内容，例如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普遍参与、高度的社会职业及结构分化、广泛的成就取向等等，但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是大幅度提高以工业化为主轴的社会生产力，使传统的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的工商社会，大大降低农业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使整个社会的结构完全改变。这样，政治、文化、观念各方面的现代化才有可能相应产生，环顾现代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普遍已降到20%以下，甚至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几，而中国的农业人口至今还在70%以上，百年来无多大变化。也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两千多年来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传统的政权系统、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无一不是建立在70~80%的人口是农民这样一个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的。这个基本的社会结构不变，一切目标再崇高，抱负再伟大的革命或改革都只具有短暂的宣传上的意义，都会迅速向封建的方向变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而不久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尤其说明了这一点。本欲自辟一条不西不苏的现代化道路，结果失败了。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根本的一条就是离开生产力的提高，不致力于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去奢谈什么“跟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结果适得其反，连最恶劣的传统观念都复活了。

第四、认识国家力量、政治力量的局限性

在现代化运动中，“本土”型国家发展的道路大致是经由文艺复兴的启蒙引起科学的发展，由科学的发展引起工业革命，由工业革命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积累了社会财富，再加上侵略和掠夺所得，形成巨大的原始资本，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工商革命，农业社会变成工商社会。农业人口比例大大减少，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形成一个人数众多，富裕而稳定的中产阶级，由此导致政治、习俗、观念、行为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其过程是由下而上，由民间而政府，由经济而政治的自然渐进式。在整个过程中，政治的作用表现得不强烈，国家的参与表现为一种顺应与调节。但是“后来者”型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原始动力来自外部的激发，往往是一批政治文化型的精英分子首先觉醒，痛切呐喊，向外寻求真理，以求改造国家。所以在这类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中，政治因素一开始就很强烈，由精英分子领导推翻旧体制而建立的新政权，尤其是

(下转第17页)

切阻碍主体潜能开发的旧道德准则、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都在革除之列。而当这一工作的进行及其效果——主体潜能的爆发冲垮了传统的框框和平静时，我们千万不能惊慌失措，更不能畏缩退却。

第三，主体潜能的开发工作，必须完成从浅层向深层、从号召型向保障型、从偶然性向必然性的转变，即将领导人的主体潜能的开发意识，经由决策、立法到建立完善的社会机制，真正达到势在必行、不可逆转的程度。这便是说，要围绕主体潜能的开发进行充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改革。

第四，主体潜能主要指的是人的智能，现代生产力早已具有了智能的性质。因此，主体潜能的开发主要是智力开发。一说到智力开发，可能以为就

是教育以及各种人才的培养，其实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民族智力的开发主要靠思维的自由，靠每个人智力空间的独立、扩大和丰富。所以，主体潜能开发，除了尊重知识分子外，更重要的是给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人以思考、想象、创作、设计、选择和批评的权利，彻底改革教育，从实际生活到教育都贯彻一个基本原则，即培养中国人的独立思考、自主评判和标新立异的创造能力。为了现代化，不管教条主义多么惧怕这一点，不管传统怎样围剿这一点，我们必须接受并实施这一点。

本文作者远志明 (Yuan Zhiming) 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上接第7页)

社会主义型的，往往是现代化运动的强有力的组织者与推动者。所以这类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的开始阶段是自上而下，由政府而民间，由政治而经济的急进型，其速度往往比“本土”型快得多，但是同时也就产生很多副作用。最主要的是人民对现代化缺乏足够的自发性要求和足够的精神准备，而少数精英分子急于求成，并且往往过分迷信政治的作用，国家的作用，以为可以代替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在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社会财富尚未充分积累并自然引起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革之前，就急于谋求表面形态的现代化，结果欲速不达，适得其反。这类国家的领导集团应当认识国家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局限性，适时地转变国家和政治所扮演的角色，减少干涉性的参与，而有意识地扶植民间经济的组织活动，使民间的力量发挥出来，自动自发地从事各项表面上看来是“营私”，而实质是有助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活动。这样积以时日，让社会财富逐步积累起来，藏于民间，到一定时候自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达成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到现代工商社会

的转变。切不可操切冒进，瞎指挥，迷信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达成表面上好看的成就，重蹈过去的覆辙。

以上四点，是我们从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的观察获得的启示，当然是极其统泛的原则性的。至于现代化中各方面无数具体的问题、计划、细则，则需要汇集成千上万的专门家来研究，非本文这种架构式的统览所能及。

我觉得高兴的是，以上所谈的问题事实上在中国已经为许多有识之士所默认并且部分地在实践着。所以尽管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曲折历程而今天仍处在相当艰难的时刻，但我对它的光明前途仍有着坚定的信心。而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近20年来在现代化上取得的巨大进展尤其让我觉得这种信心是有根据的。

本文作者唐翼明 (Yiming Tang) 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

科技动态

电子嗅觉装置和激光视觉装置

新华社伦敦分社3月19日报道，英国航天公司研制出的这种装置能可靠地、迅速地查出走私毒品，而不损坏货物。它对可卡因的灵敏度超过受过专门训练的狗的嗅觉。这种装置使用质谱仪分析从货物和行李中抽出来的空气，使用非常简便。

塔斯社3月12日报道，日本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研究出了激光视力传感装置。它可在高温条件下有效地工作。人造视觉能有把握地在被火焰包围的房间内辨别出那里的所有东西，可以在正在燃烧的房间帮助找到处于灾难中的人和保险柜等。这种传感装置借助红外线确定房间里物体的轮廓，并把它们的图象传送到荧光屏上。